

# 民族-国家双重社会认同结构及其影响

——以云南汉族和少数民族居民调查为例\*

高文珺<sup>1</sup>, 赵志裕<sup>1,2</sup>, 杨宜音<sup>1</sup>, 冯江平<sup>3</sup>

(1. 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 北京 100732; 2. 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商学院, 新加坡 639798;  
3. 云南师范大学教育科学与管理学院, 云南 昆明 650500)

**[摘要]** 本研究从多重社会认同研究视角出发, 分析了汉族与少数民族的民族-国家双重社会认同的结构、影响因素及其与群体间知觉的关系。对云南省昆明市和昭通市的 643 名汉族和 364 名少数民族社区居民进行问卷调查。结果显示, 调查对象的民族认同和国家认同之间呈正相关关系, 又存在显著差异, 整体上国家认同要显著强于民族认同, 汉族的民族认同要明显低于少数民族。民族-国家双重社会认同两维结构得到证实, 认同类型主要包括 4 种: 整合型、民族型、国家型和弥散型, 汉族调查对象主要表现为整合型和弥散型认同, 少数民族表现出全部 4 种类型的认同模式。居住环境影响少数民族的民族-国家认同, 所在社区汉族居民较多时, 少数民族居民更多地表现出整合型和国家型的民族-国家认同。群际知觉因民族-国家认同类型不同而有差异, 整合型认同调查对象的群际知觉最为积极, 弥散型认同的调查对象群际知觉最为消极。调查结果有助于深入把握人们对民族身份和国家身份的管理模式, 以及由此形成的民族-国家双重社会认同对群体关系的影响和意义, 有利于制定更有效的政策以促进积极的群际知觉。

**[关键词]** 多重社会认同; 民族认同; 国家认同; 群际知觉

**[中图分类号]** C912.6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0-5110(2013)05-0064-12

## 一、理论基础与问题提出

### (一) 民族认同与国家认同研究概述

在多民族国家和地区中, 各民族之间的和谐关系是社会稳定的基石。中国是由 56 个民族组成的多民族国家, 随着经济迅速发展和从业结构多元化, 各民族逐渐打破地域限制, 彼此之间交流互动不断增多。促进不同民族成员之间, 特别是少数民族和汉族之间的积极互动, 对于社会和谐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对群体身份认同和群际关系的深入理解有助于更有效地达成这一目标, 相关研究由此引起了研究者的广泛关注。

心理学研究往往将民族认同和国家认同纳入社会认同的范畴。<sup>[1]</sup> 社会认同是个体将自身归属于某个类别或群体的心理过程, 社会认同理论 (social identity theory, SIT) 关注社会身份的建构过程及其对社会思维和社会行动造成的影响,<sup>[2]</sup> 该理论被广泛应用于社会认知、群际关系和群体过程等研究领域。<sup>[3]</sup> 民族和国家是个体所属

的社会群体之一, 在多民族国家中, 这种社会身份尤其突出, 身份认同也因此成为民族心理研究中占据重要地位。Phinney 等指出, 民族认同是多维度的动态结构, 核心成分包括对本民族的积极探索了解以及承诺和归属感。<sup>[1]</sup> 相应的, 国家认同可以理解为是同一国家内不同民族成员对于自己国家公民身份的认同感。民族认同和国家认同之间的关系一直是学者们讨论的热点, 西方早期研究认为两种认同之间是负相关关系, 而后来的研究又认为两者是相互独立的, 可能是正相关、负相关或者是无关联,<sup>[4]</sup> 并通过对移民青少年的一项调查证实了这一观点。<sup>[5]</sup> 国内研究者结合本土特点, 围绕民族认同和国家认同的关系, 进行了较丰富的理论分析和实证探索。费孝通在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的理论中, 通过对民族认同层次的区分, 从概念上分析了中国人的民族认同和国家认同。他认为, 中国的民族概念包括两个层次, 一是中华民族统一体, 二是组成中华民族的 56 个民

\* [收稿日期] 2013-06-24

[基金项目] 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创新项目“我国社会心态状况研究”; 中国博士后科学基金资助项目 (项目批准号: 2012M520526)。

[作者简介] 高文珺 (1983—), 女, 黑龙江哈尔滨人, 中国社会科学院博士后, 研究方向为社会心理学。

族。<sup>[6],[7][p.304-311]</sup>因此,民族认同也包括对中华民族的认同和56个民族成员对各自民族的认同两个层面,<sup>[6]-[8]</sup>前者可以理解为是对国家的认同。还有研究者通过实证研究初步分析了民族认同和国家认同的关系,如一项对西南地区少数民族大学生的研究发现,民族认同和国家认同中度正相关,同时也存在差异,国家认同得分高于民族认同。<sup>[9]</sup>另一项对汉族和少数民族青少年的研究得到了类似结果,调查对象的民族认同和国家认同既相关又存在显著差异,国家认同高于民族认同,并且,少数民族青少年的国家认同要高于汉族青少年。<sup>[10]</sup>在民族认同和国家认同的影响方面,前述研究发现,在民族冲突情境中,民族认同高或国家认同高的大学生倾向于选择积极应对策略,而民族认同低的大学生则倾向于做出消极应对。<sup>[9]</sup>梁进龙等则在研究中发现,<sup>[11]</sup>民族认同和国家认同可以正向预测回族、汉族高中生的自尊水平,国家认同预测力更强。

从上述分析看出,国内外围绕民族认同和国家认同开展的相关研究已取得了一定成绩,但仍存在一些薄弱环节,值得我们做进一步补充和完善。这些薄弱之处主要体现在如下两个方面:首先,尽管国内对于民族认同和国家认同之间的关系和影响进行了一定的探索,但大多是将民族认同和国家认同分开讨论,鲜有研究从整体视角构建人们的民族-国家认同结构并分析这种认同结构对群际关系的影响。国外有研究者曾对此进行过尝试,<sup>[5]</sup>但主要关注的是移民的民族-国家认同状况,与我国民族状况有较大差异。其次,国内目前的民族或国家认同研究,大多是针对某个少数民族群体而开展,虽有研究同时调查汉族和少数民族,<sup>[11]</sup>但鲜有研究分析某一地区多个民族的民族-国家认同情况。而要深入研究民族-国家认同,文化差异唤醒可能是一个重要条件。即便在多民族国家,很多时候,人们可能还是多与自己民族的人交往,文化差异的碰撞并不明显,因此,民族认同和国家认同的协调可能还要在多民族文化交汇地区进行研究,才更利于深入理解多重社会认同的特点。

针对上述研究局限,本研究将引入多重社会认同分析视角,分析多民族聚集地的汉族和少数民族居民的民族-国家双重社会认同结构、影响因素以及不同类型的民族-国家双重社会认同结构对于群际知觉的影响,进而分析民族-国家认同对于群际关系的意义。

## (二)多重社会认同视角下的民族与国家认同研究

传统社会认同研究较多关注个体的某种社会认同(如性别、民族、职业等)对社会认知、行为和群际关系的影响,而现实生活中,人们往往隶属于多个群体,这些群体中,有一些可能彼此高度重叠,这时的社会认同也就比较单一;相反,有的群体类别之间可能只是部分重叠,这种情况下,人们如何构建自己的多重社会认同就变得复杂起来。近10年来,学者们开始逐渐将研究视野从单一社会认同扩展至多重社会认同(multiple social identities)。<sup>[12]-[15]</sup>而多民族国家居民对本民族、国家的认同,正是常见的多重社会身份,可以借鉴多重社会认同研究视角进行分析。

对于多重社会认同的结构,研究者曾提出社会认同复杂性(social identity complexity)的理论来分析人们管理其多重群体身份的方式。<sup>[12]</sup>社会认同复杂性用来区分个体应对其不同群体身份方式上的差异,以对两种群体身份管理为例,复杂程度低的社会认同结构是个体主观地将这两种身份嵌入一种认同中,或是取两者交集,或是以其中一个群体身份为主导;复杂程度高的社会认同则是个体意识到两种身份之间的差异,或是在某一情境中认同其中某一身份,或是同时认同两种身份。在对具有双重文化背景个体的研究中,研究者们分别发现了上述4种不同的认同管理方式,第一种认同方式是取民族和国家层面的交集,形成对生活在同一国家中同一民族的人的认同;<sup>[16]</sup>第二种是将某种认同置于另一种认同之上,形成民族主导认同或是国家主导认同;<sup>[17]</sup>第三种是区隔式认同,在不同情境中,选择不同认同,或认同民族,或认同国家;<sup>[18]</sup>第四种则是整合式认同,个体同时对民族和国家具有高度认同。<sup>[19]</sup>Berry等人对5366名来自不同国家的青少年移民的文化适应的研究,<sup>[5]</sup>在很大程度上印证了社会认同复杂性的存在,勾勒出民族认同和国家认同之间可能呈现出的不同模式。所调查的青年中,以民族认同和国家认同为重要组成的文化适应呈现出4种类型,分别是以民族认同为主导的民族(ethnic)模式,以国家认同为主导的国家(nation)模式,以高度民族和国家认同为特点的整合(integration)模式,以及民族和国家认同都很低、处于模糊认同状态的弥散(diffuse)模式。

在上述研究结果之上,本研究假定我国汉族和少数民族居民的民族和国家双重社会认同类型

可以概括在如图 1 所示的两维结构之中,这些不同类型的民族-国家社会认同对人们的群际知觉

会产生不同影响,本研究将对此逐一进行检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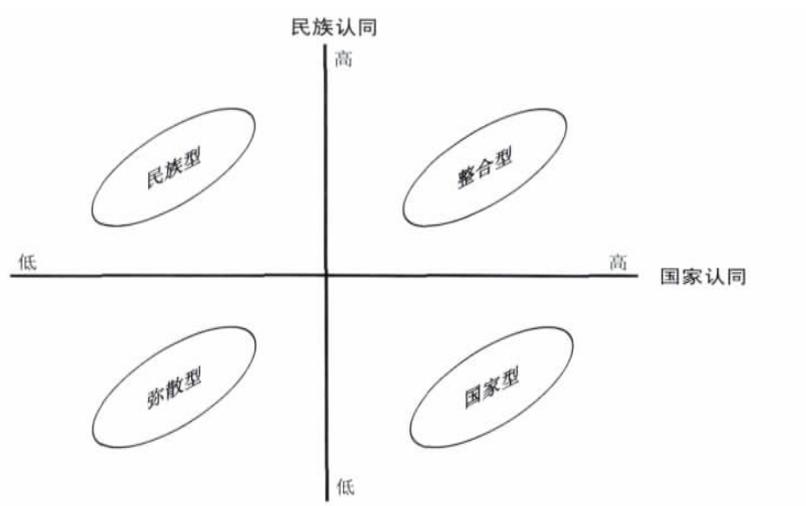


图 1 民族-国家双重社会认同两维结构示意图

## 二、研究方法

### (一)调查对象

国内以往的民族认同和国家认同研究,大多是以单一少数民族大学生为调查对象,忽视了对主流群体和多民族群体的研究。本研究将调查对象扩展至汉族和少数民族居民,并选取了云南省这样一个汇集了多个民族的有代表性的多民族交汇地区作为调查地点,重点将汉族居民相对较多的昆明市和少数民族居民相对聚集的昭通市作为具体调研地点。由受过专门培训的调研员分别在社区进行一对一的问卷调查,两地共计回收有效问卷 1007 份,其中,汉族居民为 643 人,占 63.9%,少数民族居民 364 人,占 36.1%,基本符合 2010 年全国第六次人口普查数据所报告的云南省汉族人口(66.63%)和少数民族人口(33.37%)的比例。<sup>[20]</sup>汉族居民中,男性 302 人,占 47.0%,女性 336 人,占 52.3%(信息缺失 5 人);年龄跨度为 18—70 岁,平均年龄 38 岁。少数民族居民中,男性为 183 人,占 50.7%,女性为 178 人,占 49.3%(信息缺失 3 人);年龄跨度为 18—70 岁,平均年龄 31 岁。使用 IBM SPSS20.0 统计软件对数据进行分析。

### (二)测量工具

#### 1. 民族认同和国家认同测量

民族认同的测量使用的是多元群体民族认同测量的修订版本(Multigroup Identity Measure—Revised, MEIM)。<sup>[1]</sup>该量表被广泛用于测量一般民族群体的民族认同情况。原量表包括 14 个题目,几次修订后,形成了 6 个题目的简版量

表,分别测量了民族认同的两个核心成分:承诺(commitment)和探索(exploration)。其中,承诺是指对于群体的强烈依恋感和个人投入,探索是指寻求与自己民族有关的信息和体验,这两个成分共同存在才是一种自信和成熟的民族认同。量表采用 Likert 5 点计分形式,其中“1”表示“非常不赞同”,“5”表示“非常赞同”,由 1 到 5,赞同程度逐渐增强。该量表在之前对多个民族群体的研究中都取得了良好的信度和效度结果,<sup>[1]</sup>本研究中,量表信度分别为:探索分量表信度 0.603,承诺分量表信度 0.797,量表总信度 0.737。

国家认同的测量是根据民族认同量表,编制 6 个题目测量对国家公民身份的探索和承诺。本研究中,量表信度分别为:探索分量表信度 0.643,承诺分量表信度 0.749,量表总信度 0.740。

#### 2. 刻板印象、情绪和行为测量

应用 Cuddy 等人在群际情绪—刻板印象—行为趋向系统模型(Behaviors from intergroup affect and stereotypes map framework, BIAS Map)基础上编制的量表,<sup>[21]</sup>测量作答者对社会上流行的有关少数民族的刻板印象、情感和行为倾向的知觉。该量表以刻板印象内容模型(Stereotype content model, SCM)为基础,结合情绪和行为测量,分别从热情和能力两个维度测量刻板印象,从轻视、同情、妒忌和敬佩 4 个维度测量群际情绪,从主动促进(如帮助)、被动促进(如合作)、主动伤害(如斗争)和被动伤害(排斥)4 个维度测量行为倾向。本研究使用的是每个维度两个题目,共 20 题的量表。量表采用 Likert5 点计分

形式,询问作答者题目与社会上大多数汉族人对少数民族群体的看法、感受和行为的符合程度,本研究中,各个维度分量表的信度在 0.603 至 0.868 之间。

### 三、研究结果

#### (一) 民族认同和国家认同的关系

##### 1. 民族认同和国家认同的差异

采用重复测量方差分析的方法比较调查对象民族认同和国家认同之间的差异。首先将认同(民族和国家两个层面)作为被试内变量分析差异;同时,为进一步比较不同人口学变量群体的信念差异,将民族背景(汉族和少数民族)作为被试间变量纳入重复测量分析<sup>①</sup>。结果显示(见表1),认同层面和民族背景的主效应均显著,且两者交

互作用亦显著。具体来说,首先,调查对象的民族认同和国家认同之间存在显著差异,国家认同( $M=3.780$ )显著高于民族认同( $M=3.391$ ),对交互作用的简单效应分析发现,无论是对于汉族还是少数民族,国家认同均高于民族认同,两者之间差异的显著性在汉族( $F=433.934; p=0.000$ )之中要比在少数民族( $F=6.845; p=0.009$ )之中更明显。少数民族调查对象的民族、国家认同感平均强度( $M=3.703$ )要强于汉族调查对象( $M=3.519$ ),交互作用的简单效应分析发现,这种强度差异主要表现为少数民族调查对象的民族认同感显著强于汉族调查对象( $t=-9.114; p=0.000$ ),而不同民族调查对象的国家认同感强度则没有显著差异( $t=.796; p=0.426$ )。

表1 民族认同和国家认同重复测量方差分析结果( $N=1007$ )

	汉族		少数民族		总计		认同主效应	交互作用
	M	SD	M	SD	M	SD		
民族认同	3.245	0.627	3.648	0.750	3.391	0.701	$F=196.039$ $p=0.000$	$F=87.706$ $p=0.000$
国家认同	3.792	0.663	3.757	0.711	3.780	0.680		
总计	3.519	0.553	3.703	0.614				

民族背景主效应: $F=23.700, p=0.000$

##### 2. 民族认同和国家认同的相关

为更全面把握民族认同和国家认同之间的关系,在比较两者差异之后,对两者之间的相关也进行了分析。首先,从整体上分析汉族和少数民族调查对象的数据,控制性别和民族背景等人口学变量的影响,对调查对象的民族认同和国家认同进行偏相关分析,偏相关结果显示,民族认同和国家认同之间存在显著正相关( $r=0.444; p=0.000$ ),对所属民族认同程度越高,对国家的认同程度也越强。

其次,再比较不同民族背景的调查对象,其民族认同和国家认同之间的相关特点。控制性别影响之后,偏相关分析结果显示,汉族和少数民族调查对象的民族认同和国家认同均显著相关,在相关强度上,汉族( $r=0.466; p=0.000$ )强于少数民族( $r=0.414; p=0.000$ )。

#### (二) 汉族和少数民族调查对象的民族-国家双重社会认同特点

从前述分析结果看,一方面,民族认同和国家认同存在显著差异,表明调查对象并没有完全将这两种社会身份重叠在一起,提示了复杂社会认

同结构的存在。另一方面,在我国这样一个多民族国家中,汉族和少数民族分别代表了多数人群体和少数人群体,这两个群体的民族认同、国家认同的特点和影响因素,以及两种认同之间的关系都可能因群体地位不同而有所不同。而分析结果也显示出汉族和少数民族调查对象的本民族认同程度有显著差异,汉族调查对象的民族和国家认同差异强度和相关性又都强于少数民族,表明两个群体的民族-国家认同结构关系可能会有不同。为分析这两个群体民族和国家双重社会认同的特点,分别对汉族调查对象数据( $N=643$ )和少数民族调查对象数据( $N=364$ )进行分析。

##### 1. 汉族调查对象民族-国家双重社会认同的特点

为判断汉族调查对象的民族-国家认同结构是否可纳入本研究所提出的民族-国家双重社会认同二维结构中,以民族认同和国家认同作为聚类依据,对调查对象进行Q型聚类分析,分析其民族-国家双重社会认同模式是否可被划分为几个类别。对于聚类使用的认同变量均进行了标准化处理,使用离差平方和法(Ward's method)进

<sup>①</sup> 初次分析时,考虑了性别因素的影响,将其作为被试间变量纳入分析。结果表明,对于本研究中所考察的认同变量,性别没有任何显著效应。因此,在最终的分析中,不再考虑性别变量。

行距离计算。根据谱系图(dendrogram)的结果,汉族调查对象的民族-国家认同模式可以分为两类,每个类别的属性和特点见表 2 和图 2。从图 2 中可以看出,这两个类别可分别落入本研究所提出的两维认同结构中的第 3 和第 1 象限之中,第 1 类调查对象具有较低的(低于均值)民族认同和国家认同,属于弥散型民族-国家认同,第 2 类调查对象具有较强的(高于均值)民族认同和国家认

同,属于整合型民族-国家认同。为进一步判断聚类分析所得的类别划分是否合理,使用 T 检验比较不同类型双重认同模式的调查对象,在民族认同和国家认同两个变量上的高低差异是否显著,结果表明(见表 2),整合型认同的调查对象的民族认同和国家认同均显著高于弥散型调查对象,表明对汉族调查对象民族-国家认同模式的两类划分是合理的。

表 2 汉族调查对象民族-国家双重社会认同模式分类及差异(N=643)

类别	人数	民族认同	国家认同
1 弥散型	365	2.892	3.413
2 整合型	278	3.710	4.291
不同类别之间认同的 T 检验结果		t = -21.444***	t = -22.058***

注:\*\*\*表示 p<.00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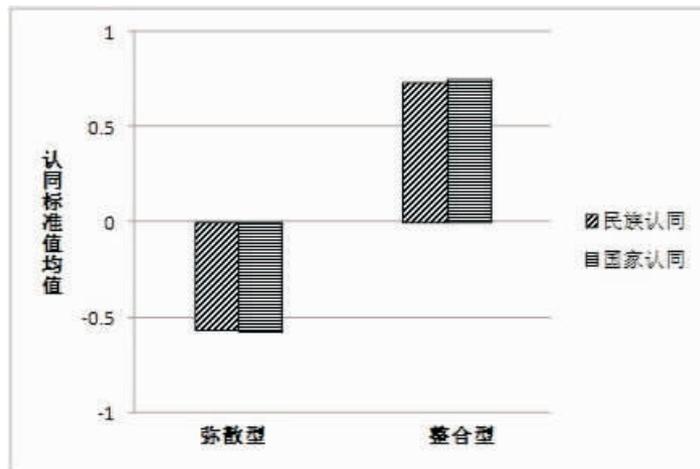


图 2 汉族调查对象民族-国家双重社会认同模式标准值示意图(N=643)

## 2. 少数民族调查对象民族-国家双重社会认同的特点

为判断少数民族调查对象的民族-国家认同结构是否可纳入本研究所提出的民族-国家双重社会认同的两维结构中,以民族认同和国家认同

作为聚类依据,对调查对象进行 Q 型聚类分析。对于聚类使用的认同变量均进行了标准化处理,使用离差平方和法进行距离计算。根据谱系图结果,少数民族调查对象的民族-国家认同模式可分为 4 类,每个类别的属性和特点见表 3 和图 3。

表 3 少数民族调查对象民族-国家双重社会认同模式分类及差异(N=364)

类别	人数	民族认同	国家认同	同一类别内民族和国家认同重复测量方差检验
1 整合型	73	4.375	4.587	F=13.819***
2 民族型	97	4.167	3.589	F=152.605***
3 国家型	119	3.237	3.99	F=234.039***
4 弥散型	75	2.924	2.789	F=1.834
不同类别之间认同的方差检验		F=185.907***	F=292.559***	

注:\*\*\*表示 p<0.00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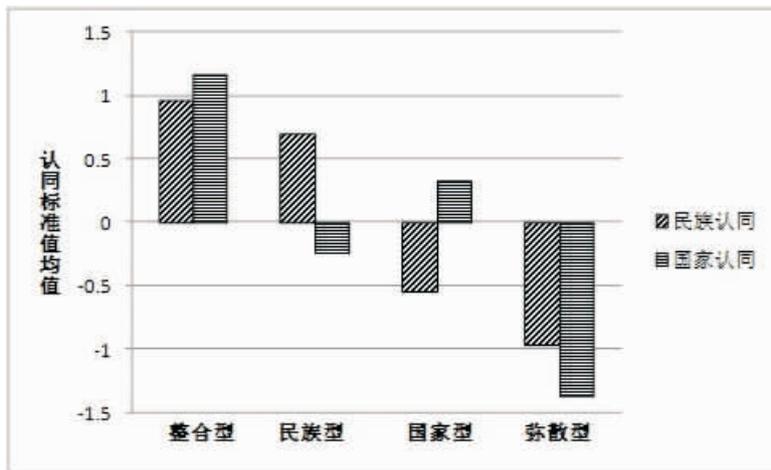


图 3 少数民族调查对象民族-国家双重社会认同模式标准值示意图(N=364)

从图 3 中可以看出,这 4 个类别恰好对应本研究所提出的两维认同结构所形成的 4 个象限,第 1 类调查对象具有较高的民族认同和国家认同,属于整合型民族-国家认同,第 2 类调查对象具有较强民族认同和较低国家认同,属于民族型民族-国家认同,第 3 类调查对象具有较弱民族认同和较强国家认同,属于国家型民族-国家认同,第 4 类调查对象具有较低民族认同和国家认同,属于弥散型民族-国家认同。为进一步判断类别划分是否合理,首先,使用方差分析比较不同类型双重认同模式的调查对象,在民族认同和国家认同两个变量上的高低差异是否显著,结果表明(见表 3),不同类型调查对象的民族和国家认同均存在显著差异,并且,进一步多重比较发现,这种差异在不同类型之间都是显著的。其次,为判定每个类别中,主要是民族型和国家型认同类别中的民族认同和国家认同两者之间的高低差异是否显著,对每类调查对象的数据进行重复测量方

差分析,将民族认同和国家认同作为被试内变量分析差异,从结果可以看出(见表 3),民族型认同的调查对象的民族认同显著高于国家认同,而国家型认同的调查对象的国家认同显著高于民族认同。上述分析结果均表明,对少数民族调查对象民族-国家认同模式的 4 类型划分是合理的。

(三)民族-国家双重社会认同的人口学差异

为判断汉族和少数民族的民族-国家双重社会认同模式是否会因性别和居住环境等人口学因素而有所差异,采用交叉列联表分析,比较不同人口学变量类别中所存在的认同模式的比例是否有显著差别。首先,使用交叉列联表,分别比较了汉族调查对象两种认同模式和少数民族调查对象 4 种认同模式在男女中的比例差异,结果显示(见表 4 和表 5),无论是汉族还是少数民族,其双重社会认同模式的分布在性别变量上都不存在显著差异。

表 4 不同人口学变量汉族居民认同模式比例的卡方检验(N=643)

人口学变量	整合型	弥散型	$\chi^2$ 值
	人数 (在该人口学变量中所占比例)	人数 (在该人口学变量中所占比例)	
男性 (N=302)	127 (42.1%)	175 (57.9%)	.258 (p=0.631)
女性 (N=336)	148 (44.0%)	188 (56.0%)	
居住地汉族居民为主 (N=611)	269 (44.0%)	342 (56.0%)	3.133 (p=0.099)
居住地少数民族居民为主 (N=32)	9 (28.1%)	23 (71.9%)	

注:因个别缺失值的存在,性别变量人数总和不足 643。

表 5 不同人口学变量少数民族居民认同模式比例的卡方检验(N=364)

人口学变量	整合型	民族型	国家型	弥散型	$\chi^2$ 值
	人数 (在该人口学变量 中所占比例)	人数 (在该人口学变量 中所占比例)	人数 (在该人口学变量 中所占比例)	人数 (在该人口学变量 中所占比例)	
男性 (N=183)	39 (21.3%)	52 (28.44%)	58 (31.7%)	34 (18.6%)	1.785 (p=0.618)
女性 (N=178)	33 (18.5%)	44 (24.7%)	60 (33.7%)	41 (23.0%)	
居住地汉族居民为主 (N=148)	44 (29.7%)	20 (13.5%)	55 (37.2%)	29 (19.6%)	29.435 (p=0.000)
居住地少数民族居民为主 (N=216)	19 (13.4%)	77 (35.6%)	64 (29.6%)	46 (21.3%)	

再使用交叉列联表分析,分别比较了汉族调查对象两种认同模式和少数民族调查对象的4种认同模式在居住地点上的比例差异,结果显示(见表4和表5),汉族调查对象无论是居住在汉族居民为主的社区还是居住在少数民族居民为主的社区,其认同模式的分布都没有显著差异。但是,对于少数民族调查对象来说,认同模式与社区的民族构成关系显著,从表5中看出,居住地汉族居民偏多的时候,少数民族调查对象中,整合型和国家型民族-国家认同模式出现的比例相对较高,民族型认同出现的比例相对较少;而当居住地少数民族居民偏多时,少数民族调查对象则更多表现出民族型认同,而很少表现出整合型认同。

(四)民族-国家双重社会认同与群际知觉

本研究将调查对象知觉到的社会上大多数汉族人对少数民族居民的印象、情感和行为界定为社会上流行的有关少数民族的刻板印象和态度。首先从整体上比较汉族和少数民族调查对象对于流行刻板印象的知觉,然后再在汉族和少数民族群体内,分别比较双重社会认同模式不同的调查对象刻板印象知觉的差异。

1. 汉族和少数民族调查对象的刻板印象知觉差异

使用T检验比较汉族和少数民族调查对象对于社会上流行的有关少数民族的刻板印象的知觉是否存在差异,结果见表6。

表6 汉族和少数民族调查对象刻板印象知觉的T检验比较结果(N=1007)

SCM	汉族 均值	少数民族 均值	t 值
认知:			
热情	3.770	3.906	-2.739**
能力	3.417	3.507	-1.641
情感:			
敬佩	3.291	3.398	-1.897
轻视	1.960	2.343	-6.580***
妒忌	2.376	2.669	-5.728***
同情	2.516	2.680	-2.743**
行为:			
主动促进	3.361	3.240	2.157*
被动促进	3.309	3.272	.605
主动伤害	1.935	2.420	-8.094***
被动伤害	1.914	2.377	-7.713***

注:\*\*\*表示  $p < 0.001$ , \*\*表示  $p < 0.01$

从表6中可以看出,对于社会上大多数汉族人如何看待少数民族,汉族和少数民族调查对象

的知觉存在显著差异。一方面,少数民族要比汉族调查对象更多地感知到汉族人多认为少数民族

是热情的、对其具有同情的情感;另一方面,少数民族又要比汉族调查对象更强烈地感知到多数汉族人对其的轻视和妒忌情感以及伤害行为,更少感知到汉族人对其的主动帮助行为。汉族和少数民族调查对象对能力、敬佩情感和被动促进行为(如合作)的感知没有显著差异。

### 2. 汉族调查对象的民族-国家双重社会认同与刻板印象知觉

为比较汉族调查对象对流行刻板印象的知觉是否会因其民族-国家双重社会认同模式不同而有差异,使用 T 检验对此进行分析,结果见表 7。

表 7 不同认同模式汉族调查对象刻板印象知觉的 T 检验比较结果(N=643)

SCM	整合型 均值	弥散型 均值	t 值
认知:			
热情	3.883	3.684	-3.448***
能力	3.527	3.333	-3.127**
情感:			
敬佩	3.462	3.161	-4.506***
轻视	1.849	2.044	3.001**
妒忌	2.362	2.388	0.426
同情	2.504	2.525	0.288
行为:			
主动促进	3.547	3.219	-5.052***
被动促进	3.421	3.223	2.499*
主动伤害	1.836	2.011	-2.735**
被动伤害	1.807	1.995	2.682**

注:\*\*\*表示  $p < 0.001$ ,\*\*表示  $p < 0.01$

从表 7 中可以看出,和弥散型认同模式的汉族调查对象相比,整合型认同的汉族调查对象知觉到的社会上流行的有关少数民族的刻板印象和态度整体上更为积极,更相信大多数人都认为少数民族热情、有能力,情感上也更多敬佩,更少轻视,行为上多表现出主动和被动促进,如帮助和合作,而更少表现出主动和被动伤害,如斗争和排斥。两种认同类型的调查对象对于大多数汉族人对少数民族的妒忌和同情情感的知觉并没有显著差异。

### 3. 少数民族调查对象的民族-国家双重社会认同与刻板印象知觉

为比较少数民族调查对象对有关其的流行刻板印象的知觉是否会因自身民族-国家双重社会认同模式不同而有差异,使用方差分析对此进行分析,结果显示(见表 8),不同认同模式的少数民

族调查对象知觉到的社会上流行的有关少数民族的刻板印象存在显著差异,主要表现在如何知觉大多数汉族人对少数民族居民热情和有力度的印象,钦佩的情感与促进行为。进一步多重比较分析发现,第一,整合型双重社会认同的调查对象的知觉要比其他三种认同类型的调查对象积极,整合型的调查对象更多地感知到多数汉族人认为少数民族热情、有能力,对少数民族的情感是敬佩的,表现出帮助、合作等主动和被动促进行为。第二,民族型认同的调查对象对于能力刻板印象的感知要显著强于国家型和弥散型认同的调查对象。第三,国家型认同的调查对象对于敬佩情感和主动促进行为的感知要显著强于弥散型认同的调查对象。对于其他刻板印象知觉,不同类型的调查对象并没有表现出显著差异。

表 8 不同认同模式少数民族调查对象刻板印象知觉的方差检验结果(N=364)

SCM	整合型 均值	民族型 均值	国家型 均值	弥散型 均值	F 值
认知:					
热情	4.348	3.881	3.807	3.669	11.007***
能力	3.979	3.598	3.292	3.273	11.312***
情感:					

敬佩	3.764	3.356	3.382	3.127	7.034***
轻视	2.236	2.464	2.303	2.353	0.822
妒忌	2.701	2.660	2.630	2.713	0.215
同情	2.667	2.711	2.661	2.680	0.062
行为:					
主动促进	3.599	3.191	3.248	2.953	6.955***
被动促进	3.634	3.227	3.206	3.093	4.846**
主动伤害	2.215	2.438	2.466	2.520	1.459
被动伤害	2.243	2.433	2.277	2.593	2.240

#### 四、结果讨论

##### (一)民族认同和国家认同的关系

本研究对汉族和少数民族居民民族认同和国家认同关系的分析,得到和以往研究相一致的结果<sup>[4],[9],[10]</sup>,民族认同和国家认同既有正相关关系又存在显著差异,整体上调查对象的国家认同程度要高于民族认同,并且这种差异在汉族居民中更为明显,因为汉族的本民族认同感要远低于少数民族。对于这一现象,可能的一种解释是,中国是汉族占人口大多数(超过 90%)的多民族国家,对于汉族来说,民族身份在日常生活中并不像少数民族那样突出,因而对本民族的认同感就相对较弱。而无论是占据大多数的汉族还是占据少数的少数民族,整体上的国家认同都没有显著差异,可能反映出我国民族工作取得了成效,让不同民族居民都对国家持有较为积极的认同。

##### (二)民族-国家双重社会认同结构

对汉族和少数民族居民的调查结果证实,民族-国家认同结构可以归入本研究所提出的民族-国家双重社会认同两维结构中。第一,对于汉族调查对象,如前所述,其民族认同和国家认同之间的差异明显强于少数民族,而从相关系数看,其两种认同的相关性也略强于少数民族,这提示汉族的民族-国家认同结构很可能呈现两极分化的情形,数据分析结果也验证了这一点。汉族调查对象的民族-国家双重社会认同表现出两种类型,分别是民族和国家认同都比较强的整合型认同和民族和国家认同都较低的弥散型认同,其中以弥散型认同的人居多(约占 56.8%)。第二,少数民族调查对象的民族-国家认同结构呈现出清晰的 4 种类型,落在两维结构的 4 个象限之中,除整合型和弥散型认同之外,还出现了民族认同强国家认同弱的民族型认同和国家认同强民族认同弱的国家型认同。其中,人数最多的是国家型(32.7%)认同,民族型(26.6%)次之,整合型(20.1%)和弥

散型(20.6%)的人数相对较少。

从上述分析看出,汉族和少数民族的民族-国家双重认同的表现形式有所差别,汉族的认同形式更多体现为民族和国家认同相辅相成,或两者统一整合,或两者都模糊难定;而少数民族的认同形式则更多元化,民族和国家认同不局限于相互映衬,还会出现程度差异,或是民族认同处于主导地位,或是国家认同更显强势。这也体现出区别分析多数群体和少数群体认同心理的重要性。此外,结果验证了民族-国家认同两维结构的存在,让我们对民族认同和国家认同之间的关系有了更深的理解,从民族认同程度的高低,并不能简单推断出国家认同程度的高低,反之亦然。人们对于多重社会身份的认同管理可以有多种方式,可能受到情境因素影响;而在分析认同与群际关系之间的关联时,不应仅考虑民族认同或国家认同的单独作用,还要关注人们对两种认同的处理方式对于群际关系的影响。后续的分析将对这些问题进行讨论。

##### (三)民族-国家双重社会认同的人口学特点

从人口学变量上看,民族-国家认同类型不受性别的影响,但是和居住环境有一定关联。以往研究显示,居住环境的民族多样性会影响青少年的文化适应类型,<sup>[5]</sup>本研究对认同类型的分析也得到了类似结果,主要体现在少数民族调查对象身上。本研究所调查的云南省,人口在 5000 人以上的民族有 26 个,各民族分布呈典型的“大杂居、小聚居”特点。调查中的汉族居民绝大多数(约 95.0%)都长期居住在汉族为主的社区,因此,其民族-国家认同类型并没有因居住地民族环境差异而有所不同。而所调查的少数民族居民,约 40.7%的人长期居住在汉族人口为主的社区,其余 59.3%的人长期居住在少数民族人口为主的社区,两者的认同类型分布存在显著差异。居住在汉族为主社区的少数民族,和居住在少数民族

为主社区的少数民族相比,前者整合型认同的人数比例明显增多,民族型认同的人数比例明显减少,国家型认同的人数比例也相对较多,两者弥散型认同的人数比例基本接近。从中看出,当少数民族居住在和汉族接触机会较多的环境时,包容性较强的国家身份(含中国的各个民族)相对凸显,而较单一的本民族身份则有所淡化,因此,在管理民族和国家双重认同时,整合型和国家型认同的人数相应增加;而当居住在和汉族接触机会较少的环境时,少数民族的本民族身份则成为日常生活中的主要身份,民族型认同人数就会大幅增多。这表明少数民族的民族-国家认同管理策略可能和其与主体民族的接触经验有关,接触经验越多,越容易形成包容性相对较强的、国家认同成分较多的社会认同结构,接近于费孝通提出的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的认同格局。<sup>[6]</sup>

#### (四)民族-国家双重社会认同与群际知觉

本研究考察了民族以及双重社会认同结构不同的调查对象,如何知觉社会上流行的有关汉族对于少数民族的刻板印象、情绪和行为。从结果看,首先,汉族和少数民族调查对象对于有关少数民族刻板印象的知觉在整体上存在显著差异,虽然两者都认为汉族对少数民族的刻板印象比较积极、情感以敬佩居多、促进行为较多、伤害行为较少。但是,少数民族要比汉族更多地感知到汉族认为少数民族热情;也更多的感知到汉族对少数民族情感和行为的消极方面,如轻视和妒忌的情感,斗争和排斥等主动或被动的伤害行为;却更少感知到汉族对少数民族的主动帮助行为。可能的原因是由于社会赞许效应的存在,汉族调查对象倾向于低估自己群体对于少数民族群体的负面情绪和行为;还有可能是因为少数民族将自己对本民族的评价投射到其他人身上,倾向于认为其他人和自己观点一致,认为少数民族都是热情的,不过,除了热情这一认知评价之外,少数民族对刻板印象和态度的知觉都要比汉族更消极,因此,前一种解释可能更为合理。

其次,无论是汉族还是少数民族调查对象,其知觉到的有关少数民族的刻板印象都因自身的社会认同结构不同而存在差异。第一,汉族调查对象中,整合型民族-国家认同的调查对象和弥散型民族-国家认同的调查对象相比,对于有关少数民族刻板印象和情绪行为的知觉都更为积极,更多感知到大多数汉族人认为少数民族热情、有能力,

对其积极情感多而消极情感少,与他们合作、帮助他们的促进行为多,而与他们争斗、排斥他们的伤害行为少。可见,此次研究中,当同时具有较强民族和国家认同时,汉族调查对象的群际知觉更为积极;但是对于认同处于弥散状态,既没有对本民族也没有对国家形成强烈认同的汉族调查对象来说,他们往往会形成消极的群际知觉。第二,少数民族调查对象中,在4种双重认同类型中,同样也是整合型民族-国家认同的少数民族所知觉到的汉族人对自己的印象、情感和行为最为积极,他们更多感知到汉族人对自己持有热情和有力量的印象、表现出敬佩的积极情感和帮助、合作等积极的行为倾向。而民族型和国家型认同的调查对象在认知、情感和行为的一些感知上也都要比弥散型的更为积极。和汉族相类似,整合型双重认同的少数民族群际知觉最为积极,以单一认同为主导的双重认同类型的调查对象对群际知觉的积极程度次之,认同模糊的调查对象的群际知觉最为消极。总体上看,汉族和少数民族调查对象在管理自己的双重社会身份时,无论是形成了整合的双重认同,还是形成了单一的包容性较强的认同(国家型)或包容性相对较弱的认同(民族型),只要有明确的认同感知,对其群际知觉来讲都具有正面意义,当然,以整合型民族-国家认同的效果最为突出。但是,如果调查对象无法形成明确的民族-国家认同,处于迷茫状态时,对其群际知觉则会产生负面影响。这表明在制定民族政策时,促进和培养少数民族的积极国家认同固然重要,但也要关注其对本民族积极认同的建立,两者共同发展可能会最大限度地改善群体间关系。而对汉族民族和国家认同感的培育同样应重视,缺乏明确认同感可能导致其对群际间关系存在认知偏差,不利于积极民族间关系的发展。

## 五、结论与未来研究方向

### (一)结论

本研究通过对多民族交汇地区的汉族和少数民族社区居民的问卷调查,分析了民族认同和国家认同的关系,在多重社会认同视角下探讨民族-国家双重社会认同的结构类型、影响因素以及其与群际知觉的关系。主要得到以下结论:(1)民族认同和国家认同既有一定程度相关,又存在显著差异,此次调查中,国家认同要显著强于民族认同。(2)本研究提出的民族-国家双重社会认同二维结构具有合理性,所调查的汉族居民主要表现

为整合型和弥散型两种类型的民族-国家认同,少数民族居民主要表现为整合型、民族型、国家型和弥散型四种类型的民族-国家认同。(3)居住环境影响少数民族的双重认同类型,生活在和汉族人接触机会较多的社区中,少数民族居民更可能表现出整合型和国家型的民族-国家认同。(4)群际知觉因民族-国家认同类型不同而有差异,整合型民族-国家认同的调查对象对于群体间印象的知觉最为积极,弥散型认同调查对象的印象则最为消极。

### (二) 研究意义与未来研究方向

个体管理其民族和国家身份的策略不同,本研究提出并验证的民族-国家双重社会认同两维结构有助于更好地把握复杂的民族和国家认同关系,分析双重社会认同的作用。同时,对于我们的民族工作也具有一定启示:首先,在开展工作前对于工作对象民族-国家认同模式的把握,有助于针对性地制定相应的政策;其次,增进少数民族和汉族长期接触的机会,有利于增加双重认同中的国家认同成分;最后,政策制定既要关注提升国家认同,也要增强民族认同,两者都有利于促进积极的群际知觉,需要注意的是消除模糊的身份认同感。

未来相关研究可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第一,扩大调查区域。本研究主要是对居住在云南省两个城市的社区居民开展调查,研究结果对于多民族交汇地区具有一定适用性,但是否能推广至其他地区还有待未来研究验证,以确认民族-国家双重社会认同两维结构的适用范围。第二,深入分析影响民族-国家认同类型的个体、社会 and 情境因素,如个体的认知闭合需要、价值观、社会的结构、群体间相似性、群体威胁感知等因素的影响,以此为改变民族-国家社会认同提供更全面的参考依据。第三,进一步寻求边界变量和中介变量,构建民族-国家认同影响群体关系的机制路径。并扩展研究思路,进一步分析双重认同类型对个体心理健康、文化能力、社会适应等的影响。

### [ 参 考 文 献 ]

- [1] Phinney, J. S., & Ong, A. D. . Conceptualization and measurement of ethnic identity: Current status and future directions[J]. *Journal of Counseling Psychology*, 2007, (3).
- [2] Tajfel, H. & Turner, J. C. . *An Integrative Theory of Intergroup Conflict*. In: W. G. Austin & S. Worchel (eds.), *The Social Psychology of Intergroup Relations* [A]. Monterey, CA: Brooks/Cole, 1979.
- [3] Hogg, M. A. & Ridgeway, C. L. . Social identity: sociological and social psychological perspectives [J]. *Social Psychology Quarterly*, 2003, (2).
- [4] Berry, J. W. . Conceptual approaches to acculturation. In K. Chun, P. Organista, & G. Marin (Eds.), *Acculturation: Advances in theory, measurement, and applied research* [A]. Washington, DC: American Psychological Association, 2003.
- [5] Berry, J. W. , Phinney, J. S. , Sam, D. L. , & Vedder, P. . Immigrant youth: acculturation, identity, and adaptation [J]. *Applied Psychology: An International Review*, 2006, (3).
- [6] 费孝通. 中华民族的多元一体格局 [J]. *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1989, (4).
- [7] 费孝通. 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修订本) [M]. 北京: 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 2003.
- [8] 方文. 群体资格: 社会认同事件的新路径 [J]. *中国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08, (1).
- [9] 史慧颖, 张庆林, 范丰慧. 西南地区少数民族大学生民族认同心理研究 [J]. *民族教育研究*, 2007, (2).
- [10] 秦向荣, 佐斌. 民族认同的心理学实证研究: 11—20 岁青少年民族认同的结构和状况 [J]. *湖北民族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07, (6).
- [11] 梁进龙, 高承海, 万明钢. 回族、汉族高中生的民族认同和国家认同对自尊的影响 [J]. *当代教育与文化*, 2010, (6).
- [12] Roccas, S. , & Brewer, M. B. . Social identity complexity [J].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Review*, 2002, (2).
- [13] Chiu, C-y. & Hong, Y-y. . *Social Psychology of Culture* [A]. New York: Psychology Press, 2006.
- [14] Bodenhausen, G. . Diversity in the person, diversity in the group: Challenges of identity complexity for social perception and social interaction [J]. *European Journal of Social Psychology*, 2010, (1).
- [15] Verkuyten, M. & Martinovic, B. . Social identity complexity and immigrants' attitude towards the host nation: The intersection of ethnic and religious group identification [J].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bulletin*, 2012, (9).
- [16] Phinney, J. S. , & Devich-Navarro, M. . Variations in bicultural identification among African American and Mexican American adolescents [J]. *Journal of Research on Adolescence*, 1997, (1).

- [17] Berry, J. W.. Psychology of acculturation: Understanding individuals moving between cultures. In R. Brislin (Ed.), Applied cross-cultural psychology [A]. Newbury Park, CA: Sage, 1990.
- [18] No, S., Hong, Y., Liao, H., Lee, K., Wood, D. & Chao, M. M.. Lay theory of race affects and moderates Asian Americans' responses to American culture[J]. 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2008, (4).
- [19] Oyserman, D., Sakamoto, I., & Lauffer, A.. Cultural accommodation: Hybridity and the framing of social obligation[J]. 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1998, (6).
- [20] 云南省统计局. 2010年云南省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主要数据公报[R]. 2011.
- [21] Cuddy, A. J. C., Fiske, S. T., & Glick, P.. The BIAS map: behaviors from intergroup affect and stereotypes[J]. 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2007, (4).